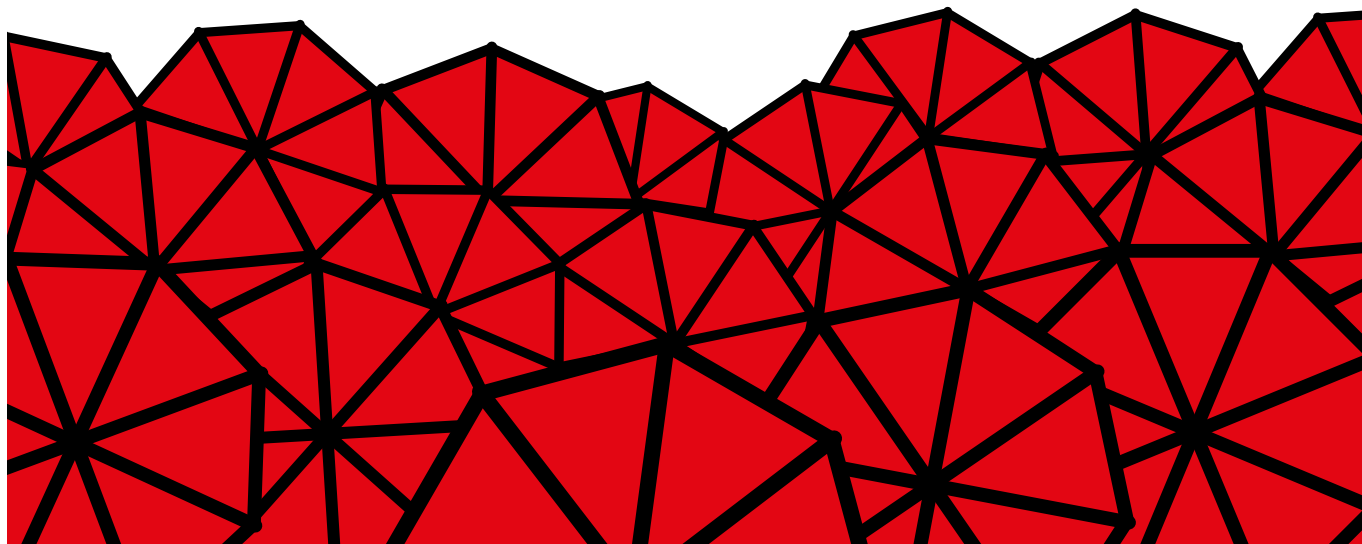




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
促进健康和人权

简报 性工作者难以获得司法救济的



性工作者难以获得司法救济的

无论是作为犯罪的受害者，还是在被指控犯罪时，性工作者在获得司法救济方面都面临广泛的障碍。性工作的刑事定罪、污名化和歧视、警察腐败和暴力限制了向警方报告罪行、成功起诉和犯罪者定罪以及获得受害者赔偿和支持服务的机会。在将性工作刑事定罪的地方，性工作者受法律保护 and 不受任意拘留的权利被警察和司法系统蓄意侵犯。世界各地的性工作者往往被排除在就业立法和劳资纠纷机制的保护之外，在民事法院受到歧视。本简报文件审查了性工作者面临的主要挑战，并指出在获得司法救济时所遭遇的侵权行为。

国际准则

获得司法救济被普遍承认为国际人权法明确规定的一项基本人权。受法律保护的权利也是《NSWP关于性工作、人权的共识声明》中列出的八项基本权利之一。¹ 这项权利对于实现性工作者的人权至关重要。

获得司法救济被普遍承认为国际人权法明确规定的一项基本人权。[...] 这项权利对于实现性工作者的人权至关重要。

《世界人权宣言》² 维护获得司法救济的权利的关键部分。该法规定了“法律平等保护”的权利，包括对侵犯权利行为的“有效补救”和隐私权不被任意侵犯。

《世界人权宣言》还保护在被指控犯罪时享有正当程序或公平待遇的权利。《宣言》主张，“任何人不得遭到任意逮捕[和]拘留”，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每个被指控犯罪的人都有权“在被证明有罪之前被推定无罪”，有权接受“公开审判”，并有权“获得辩护上所需的一切保证……”。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 的第9、10、14和15条进一步阐述了正当程序权³。《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指出，所有被捕者都有权“迅速和以[他们]理解的语言”被告知逮捕他们的理由、对他们提出任何指控，以及有权得到及时审判。《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还规定了对案件提出上诉、获得译员、获得免费法律援助的权利，以及非法逮捕或拘留者获得赔偿的权利。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CAT) 界定了酷刑，并规定了成员国打击酷刑的义务⁴。《公约》明确禁止国家官员为恐吓、胁迫、惩罚或“出于基于任何歧视的任何理由”故意造成精神或身体痛苦。它还要求各国“定期审查逮捕、拘留和监禁...规则、指示和方法”，并培训警察和其他国家官员“防止酷刑”。

联合国条约监督机构和联合国大会也讨论了获得司法救济的问题。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 (CEDAW) 在其《一般性建议：关于妇女获得司法救济》中呼吁各国“废除歧视性刑事定罪”，并确保“所有司法系统.....安全，可负担...适应和适合...妇女，包括那些面临交叉或复合歧视的妇女”。⁵

1 NSWP, 2013, “NSWP关于性工作、人权的共识声明。”

2 联合国, 1948年, “《世界人权宣言》。”

3 联合国, 1966,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4 联合国大会, 1984年,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5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 2015年, “一般性建议 33: 关于妇女获得司法救济。”

研究方法

10个国家的国家顾问使用标准化的调查问卷对性工作者进行了焦点小组和深入访谈。这项深入的国家调研在阿根廷、科特迪瓦、厄瓜多尔、缅甸、挪威、新加坡、坦桑尼亚、北马其顿共和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美国开展。此外还对全球NSWP成员使用同一调查表进行在线咨询。该调查表以多种语言提供。有18个成员进行了回复。

共有207名女性、男性和跨性别性工作者参加了焦点小组和访谈，包括有证件和无证移徙性工作者、感染艾滋病毒的性工作者、使用毒品的性工作者、来自农村和城市的性工作者以及性少数性工作者。

刑事定罪与法律压迫

性工作者面临直接或间接歧视他们的法律、程序、条例和做法。⁶全世界对性工作有不同的法律制度，但在大多数国家，性工作仍然通过禁止出售、购买、组织或促进性工作的法律而被定罪。害怕被指控与性工作有关的罪行是向警方报案的主要障碍。

“性工作者获得司法救济的最大障碍之一是性工作被刑事定罪所造成的恐惧。一位性工作者说，‘如果我被抢劫了，我甚至不敢报警，因为我是一名非法性工作者’。另一位说，‘我们害怕家人知道，我们害怕被警察抓，我们害怕政府，因为我们做错了’。这种恐惧很常见，并且与项目X在多个案例中观察到的情况一致。”

项目X，新加坡

性工作者权利倡导网络 (SWAN) 在一份关于中东欧和中亚地区针对性工作者的国家和非国家暴力行为的报告中指出，当性工作者不愿意向警方报案时，“他们对于他们、他们的同事和家人面临的风险做出了深思熟虑和知情的决定⁷”。增加性工作者获得司法救济的机会，需要国家机关处理阻碍性工作者举报犯罪的法律和执法。

增加性工作者获得司法救济的机会，需要国家机关处理阻碍性工作者举报犯罪的法律和执法。

“……一起工作的性工作者遭到‘客户’的暴力攻击，之后他们受了重伤，需要立即就医。警察在他们住院并获得紧急保健服务后来询问，之后他们认定存在一起疑似卖淫案件，并立即对性工作者采取法律行动……所有这些受害者都被送上法庭，其中一人...因为提供其[家]用于卖淫而被定罪。”

星星，北马其顿共和国

旨在“救援”或性工作者康复的反人口贩运法律和执法，也可以成为获得司法救济的障碍，尤其是对移徙性工作者而言⁸。在一些国家（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和泰国⁹）性工作者和出售性的个人被视为人口贩运受害者，可被判处强制“康复”或“再教育”。康复改造刑期是往往比一般的刑事或行政判刑和拘留时间更长，可超过所犯罪行的最高刑期。

6 NSWP, 2019, “案例研究：如何在当地实施性工作法及其对性工作者的影响。”

7 SWAN, 2015, “司法失败：针对性工作者的国家和非国家暴力以及寻求安全和补救。”

8 NSWP, 2018, “简报文件：移民性工作者,” 7-8.

9 艾滋病规划署、开发署、人口基金, 2012年, “亚洲及太平洋的性工作与法律。”

性工作者作为证人而不是作为嫌疑人或罪犯被拘留时，可能被长期关押，且没有法律顾问或权利。

如果法律允许在人口贩运案件中强迫证人提供证词，性工作者在等待法庭程序开始时可能被强迫监禁。性工作者作为证人而不是作为嫌疑人或罪犯被拘留时，可能被长期关押，且没有法律顾问或权利。在新加坡，许多移徙性工作者害怕与警方接触，不仅因为他们害怕被驱逐出境，还因为他们害怕成为反人口贩运行动的目标，并被迫留在新加坡作为证人。

“项目X记录了一个被带到新加坡工作一个月的印度性工作者案例。她被一个客户抢劫后，她向警方报告了抢劫。警方对调查将她带到新加坡的中介并进行人口贩运指控越来越感兴趣。最后，在调查进行时，这名性工作者被迫在新加坡被拘留了一年多。她在被拘留期间因急性阑尾炎去世。”

项目X, 新加坡

模糊的法律通常有助于针对边缘化群体。在坦桑尼亚，性工作者可能因不遵循性别规范而被捕：

“目前的法律制度允许警察以女性的着装方式、‘太晚’在街上和某些地区行走为由逮捕妇女。性工作者被捕不是因为他们可能做过的事情，而是因为他们的外表和行走的地方。这是一种基于性别的歧视形式，侵犯了妇女依法享有平等保护的权利。”

国家顾问, 坦桑尼亚

刑事定罪、拘留、递解出境和法律制裁都是真实风险，意味着性工作者通常不向当局报告其权利受到侵犯的情况，这实际上剥夺了他们获得司法救济的机会。

淫威执法

性工作者受到来自执法人员的系统性的身体、性及言语虐待¹⁰。

“我们在街上的行动自由受到了侵犯。我们受到身体和语言上的虐待，理由是我们造成了“公共丑闻”或穿着不当。这些法律早已废除，只是作为恐吓和伤害女性性工作者的借口。我们被喷胡椒粉被击打。因为我们走过的地方，根据他们的说法，像我们这样的人是被禁止行走的。”

性工作者, 厄瓜多尔

“[对于性少数性工作者,] 我们通常观察到身体暴力、强迫肛门检查、没收润滑凝胶和安全套以构成证据、长期被拘留警察或宪兵的牢房、身体酷刑、最高的监禁刑罚和支付巨额罚款保释。”

西部青年未来, 喀麦隆

“警察经常晚上来强迫我们和他们发生性关系。如果我们拒绝，他们就威胁酒店经理来禁止我们在那里工作。”

性工作者, 科特迪瓦

10 NSWP, 2017, “政策简报：刑事定罪对性工作者易受艾滋病毒和暴力影响。”

警察经常以法律之外的行动（例如通知朋友或家人）威胁性工作者，或利用骚扰或恐吓来获取供词。

性工作者还遭到任意逮捕、勒索、非法拘留和胁迫。警察经常以法律之外的行动（例如通知朋友或家人）威胁性工作者，或利用骚扰或恐吓来获取供词。例如，在香港，大赦国际发现：警务人员以威胁致电性工作者家属或逮捕他人，强迫虚假供词；以指控误导性工作者；对他们进行长时间的拘留或审讯；以及未告知性工作者他们的权利。¹¹ 警察可以打着帮助或支持受害人的幌子进行审问。在加拿大，亚裔和移徙性工作者网络蝴蝶记录了一个案例，警方将自己说成帮助受害者的一个小组去接触一名移徙性工作者。性工作者没有意识到这些人是警察，就提供了一份声明。这声明后来被用于指控她非法工作。¹² 即使是在任意逮捕的情况下，许多性工作者决定支付罚款或进行贿赂，而不是去冒被拘留和被送上法庭的风险。贫穷和孤立的性工作者特别容易受到司法侵权的影响。

“任意逮捕和拘留、捏造证据是警察的常见做法。例如，2018年12月，警方强迫一名性工作者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签署供词，宣称是她自己供认，[他们]威胁要栽赃毒品，搞成毒品案件，还威胁要收走住房。”

法律生命，乌克兰

“6个月前，我被警察逮捕。他们要5万缅元（35美元），我没有钱。他们带我去警察局，让我在5小时内给朋友或家人打电话，把钱带到警察局。我没有朋友（或家人）能在短时间内给我钱。我在警察局里过夜。晚上我和两个警察发生性关系，早上他们把我送到法庭。在法庭上，我不能花钱请律师，所以我在监狱里呆了3个月。”

性工作者，缅甸

“警察搜查了性工作者的房屋，并将他们带到警局。最后...勒索他们钱...那些能够负担各种款项的人被释放，那些不能的被拘留几天，直到同情她们的人来救他们。”

社群与家庭援助基金会，加纳

这些虐待经历使许多性工作者无法举报针对他们的罪行。移徙性工作者、户外性工作者、使用毒品和跨性别的性工作者遇到更大的障碍。

“没有人反映当受到犯罪侵害时他们会报警。他们都表示，无论他们发生什么事，警察都会使情况变得更糟。[一名性工作者]具体描述了她在自己的家中遭到暴力殴打，然后被送进监狱。她将这种待遇归因于她的种族和性别认同。”

国家顾问，美国

11 大赦国际，2016年，“有害孤立：将香港性工作定为犯罪。” 27-30。

12 蝴蝶，2018，“救援背后：反人口贩运调查和政策如何伤害移民性工作者。” 13。

法律制度中的歧视与偏见

“当性工作者是受害者时，无论是女性、跨性别还是男性，主要挑战是法律体系。他们常常不在乎我们的生命。由于偏见、污名和歧视，这个体系不会即时或快速反应。”

GOOVER协会，厄瓜多尔

性工作者在司法系统的所有阶段都遭受歧视。警官驳回报案，法官的不公正裁决。

性工作者在司法系统的所有阶段都遭受歧视。警官驳回报案，法官的不公正裁决。对性工作者的犯罪不像针对他人的罪行那样严重，他们的证词权重还不如犯罪者的证词。

针对性工作者的犯罪往往甚至无法送达法庭，因为他们的报案因偏见或贿赂而被驳回或忽视。

“当警察目睹其他对性工作者实施犯罪或暴力行为时...当他们只是旁观，[他们]不干预，当性工作者决定写一份有关犯罪的陈述时，他们不回应或拒绝接受该陈述，威胁说，他们将发出写着‘不要卖淫，你也不会被强奸’的传票。”

法律生命，乌克兰

“一个认识的客户拿走了我的手机和钱，并严重殴打了我。我手上有一个伤口，所以我决定报案，去了警察局。警察听我说完，并接受了投诉。警方还到我客户家与当事人交谈，但没有逮捕该男子。他们从他那里拿了钱，几天后警察叫我去警察局。警察告诉我，我从那人拿了很多钱，他还要告我。我很惊讶，警察告诉我，我必须还我拿的钱。我不得不把钱交给警察，我决定不再报警，不管我一生中发生什么事。”

性工作者，缅甸

这些歧视和偏见的经验延伸到法院。防止性攻击受害者过往性史被引入法庭的法律并不总能阻止性工作或与性工作有关的逮捕的证据被引入法庭。检察官和法官经常对性工作者有偏见。他们往往不能对针对性工作者的罪行提出指控，在审判期间加重了污名化。在土耳其，三名男子被控暴力抢劫和性侵犯一名跨性别性工作者和活动家，尽管袭击者在案发后不断骚扰受害者，最后指控还是被撤销。在肯尼亚，当一名性工作者因一名客人的殴打而报案时，检察官将案件推迟了一年，并最终告诉性工作者她的法庭档案丢失了¹³。

性工作者在因监护问题寻求援助时，也面临法律体系偏见。性工作者经常担心，在儿童监护案件中，性工作者的地位可能会被用来对付他们¹⁴。许多性工作者反映，为了获得他人都有的权利，他们不得不谎报自己的工作。

“作为性工作者.....在处理任何法律问题时，会带来许多其他问题。性工作者在儿童监护权听证会上受到歧视，因为大多数法官认为性工作者不适合当父母。为了获得住房，在我们国家，大多数时候需要一份在职信函，这是性工作者无法获得的，因此很难通过。”

国家顾问，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13 KESWA 和 BHESP, 2017, “我们不是女人吗? 肯尼亚性工作者向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提交的第68届会议的影子报告。”

14 INPUD, MPact, NSWP, 2018, “政策简报: 污名化和歧视对主要人口及其家庭的影响”。

法律援助与可及性

许多性工作者不知道自己的合法权利，缺乏平等获得法律信息和法律扫盲项目的机会。性工作者往往得不到为受害者提供的服务，如庇护所和免费法律援助，使他们特别容易受到暴力和人权侵害的影响。

“所有[焦点小组]参与者普遍认同，性工作者绝对无法获得国家提供给受害者的服务，在极少的能得到这种服务的情况下，他们都拒绝透露其性工作者的身份，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这样做，将受到歧视。”

星星，北马其顿共和国

许多性工作者反映，非政府组织，特别是性工作者领导的组织，是获得负担得起的法律援助的主要来源。因此，缺乏国家提供的法律援助对生活在农村地区或没有专门为性工作者提供服务的活跃且资金充足的非政府组织的城市的性工作者来说，是一个更大的困难。在法律援助和支持很少的地方，性工作者往往由于歧视而被国家和社会服务机构排在后面。

在法律援助和支持很少的地方，性工作者往往由于歧视而被国家和社会服务机构排在后面。

“我们的法律制度没有空间...缺乏法律援助...当涉及到这种支持和服务时，存在真空，因此，当由于经济原因性工作者被剥夺法律援助[和获得司法救济渠道]时，就出现了歧视。”

社群与家庭援助基金会，加纳

执法部门未能向个人告知其权利和提供可用的支持服务，这带来了另一个挑战。一些国家的性工作者反映，虽然国家提供法律援助和翻译，但除非提出要求，否则执法人员很少提供服务。因此，许多性工作者得不到他们所需要的和有权得到的有利于充分获得司法救济的法律援助。

对于移徙性工作者来说，缺乏译员和以本国语言提供的信息，可能导致无法使用任何可用的法律援助。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译员不易获得，大多数提供免费法律援助的律师在会见移徙工人时不知道如何谈判和克服语言障碍。

“尽管通过法律制度向包括性工作者在内公众提供法律援助诊所，但由于大多数法律援助律师的工资低，其他社会案件工作量大，导致他们不愿承担性工作者的案子。知名律师中很少有律师还志愿服务。在委内瑞拉人和其他西语移民的案件中，大多数律师没有受过针对语言障碍的培训，使得这些人更难获得司法救济，或被告知他们的合法权利。”

国家顾问，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缺乏劳工权利

由于性工作普遍定为刑事犯罪，大多数性工作者被剥夺了劳动法给予其他工人的福利和权利。劳工权利是赋权劳动者、确保安全和有保障的工作条件以及促进获得病假、最低工资、养老金和社会保障等福利的关键。

劳工权利是赋权劳动者、确保安全和有保障的工作条件以及促进获得病假、最低工资、养老金和社会保障等福利的关键。

“众所周知，在特立尼达和广大加勒比地区，性工作者没有劳工权利，没有工会代表他们进行斗争，因为这样做是非法的。性工作者没有权利使用NIS (国民保险)，因为他们无法纳税，甚至不能申报

他们的性工作收入，无法获得养老金，如果他们被剥削也没有合法渠道申诉，甚至没有法律可用于使他们受到保护。”

国家顾问，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结社自由权，包括工会和集体谈判，是《世界人权宣言》中的一项基本劳工权利。性工作者领导的组织往往得不到工会的地位或承认，在许多国家，性工作者自组织成为执法和法律制度的目标。在一些国家，反人口贩运法被用来针对致力于工会的组织。

在安哥拉，一名性工作者活动家反映，他们被执法部门盯上了：

“就我个人而言，我去年被捕，并被指控鼓励卖淫，我被关在牢房里15天。是的，这阻止了性工作者向警方举报犯罪。”

社群团结健康行动，安哥拉

在墨西哥，著名性工作者和活动家Alejandra Gil因从事组织者的工作而成为目标，最终以“人口贩运”罪名被判处15年监禁。

“我们被暴力污名，并被指为用于洗钱的人口贩运组织。这实际上导致组织死亡，以及30多年来为帮助墨西哥女性工作者所做的工作成空。因为在此之后，没有人愿意参与，因为害怕与Alejandra有联系，怕被指控人口贩运。

APROASE，墨西哥

性工作者往往得不到针对工作场所歧视和伤害的保护，难以主张工作期间收入损失或伤害的赔偿权。例如，在挪威，暴力受害者因袭击导致无法工作，损失的收入可以获得赔偿。挪威的性工作者被剥夺了这一权利。因在挪威购买性被定为刑事犯罪，专家认为，补偿性工作者失去的收入会使性工作合法化，从而破坏他们针对性工作的“终止需求”途径。

“[最高法院]拒绝性工作者的赔偿主张，声称这将破坏司法系统，因为，虽然作为性工作者是合法的，但作为一个客户和购买上述服务是非法的，给予作为暴力受害者的性工作者获得赔偿的权利将开创一个“危险的”先例，将（作为性工作者）正常化。法官表示：

“我认为，对卖淫收入给予受害者赔偿，可能会使受害者接受一种不受欢迎的活动形式，并不利于当前通过对购买性服务刑事定罪来抑制需求的效果。””

国家顾问，挪威

在性工作被承认为一种劳动形式的国家或州，性工作者仍然可能被剥夺其劳动权利。许多在合法妓院提供服务的性工作者受到管理人员的剥削和虐待，在举报时面临障碍。

“一名[参与者]在一家合法妓院工作时向经理报告了一起事件。她遭到一个客户的性侵犯。管理层劝阻她不要向执法部门报告这一事件，也不要与妓院的同事讨论此事。自己社群里的恐妓，妓院老板的偏向，以及当地执法人员的偏见，都合谋阻止性工作者举报对他们犯下的罪行，无论是家庭暴力、掠夺成性的管理者还是虐待狂客户。”

国家顾问，美国

在新加坡，开妓院本身是违法行为，但在指定地区，政府允许性工作者在由警方监管的妓院经营。这些妓院雇用的性工作者反映，尽管警方有规定，但工作条件极其恶劣。

“一名性工作者以前在一家有执照的妓院工作，他描述了持牌性工作者在一个月内只能休息四个工作日。如果性工作者想在病假以外多休息几天，将被妓院罚款，通常从70新元（51美元）到100新元（73美元）不等。”

项目X，新加坡

交叉歧视

许多性工作者面临各种形式的歧视，影响到他们在司法系统内待遇和获得司法救济的机会。性工作者经常遭受厌女、仇外、恐同和恐跨性别、种族主义和阶级歧视等多重歧视。移徙性工作者、使用毒品和感染艾滋病毒的性工作者面临更多的偏见、服务排斥和各种形式的刑事定罪。

性少数性工作者很容易因性取向或性别认同而遭受暴力，并倾向避免与警方接触以避免骚扰、逮捕或被出柜¹⁵。跨性别性工作者经常面临针对跨性别的虐待，此外他们还面临着性工作者的污名。

“当你手术前，你去派出所，被当成一个男人对待。他们要求你脱下你所有的衣服，羞辱你，‘你有一个鸡巴，你的鸡巴很大，你为什么变成那样？你应该为自己感到羞愧。’”

跨性别性工作者，新加坡

身份交叉的性工作者在尝试获得法律和受害者服务时往往面临额外的障碍。在阿根廷，跨性别性工作者和使用毒品的性工作者反映在获得庇护所等受害者服务方面出现问题。

“省和国家政府提供的资源几乎不存在，基于性别的暴力或家庭暴力受害者的性工作者，特别是吸毒者，往往得不到庇护，无论是为他们自己还是家人。我们曾发生过跨性别性工作者在身体很好时不得被送入医院的案例，因为他们没有接纳跨性别的庇护所。”

阿根廷女性性工作者协会，阿根廷

许多女性性工作者因性别而遭受歧视。他们可能只是因为偏离性别行为规范或者因她们的着装或位置而受到惩罚。坦桑尼亚和新加坡的性工作者反映，警方根据她们的外表和着装情况逮捕她们，无论她们在外面呆“太晚”，还是站在“错误”地区。

性工作者经常遭受厌女、仇外、恐同和恐跨性别、种族主义和阶级歧视等多重歧视。

15 MPact, NSWP, 2018, “简报文件：LGBT性工作者经历的仇视同性恋和变性恐惧症。”

在美国，性工作者反映，种族，尤其是黑人种族，对他们法律制度内的不公待遇起了重要作用：

“作为一个黑人妇女，这是我的命’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说，她把大部分与警察打交道都归因于对贫穷黑人的管制方式。任何时候，她都有五六个朋友或家人被监禁，这使得与司法系统打交道成为日常的磨难。”

国家顾问，美国

感染艾滋病毒的性工作者也面临交叉的障碍。在许多西方国家，与艾滋病毒有关的污名与对性少数个体的偏见有关。一名感染艾滋病毒的性工作者被禁止进入销售性不是非法的挪威。他试图前往该国参加骄傲游行时，他的艾滋病毒感染状况被曝光：

“……除了润滑油、衣服和成人玩具之外，我还装了很多避孕套。我可能会卖[性]，可能不会，这不是非法的，我准备这些是为了乐趣……负责的警官检查了我的手提箱，询问关于避孕套的情况，我告诉他们我的艾滋病毒感染状况，（当时）我是同性恋，想保护自己……他们说，他们认为我会出售服务，并决定拘留我24小时。他们把我关在牢房里，当他们来把我弄出来时，我看到他们打印了一张A4页，上面印有我的脸，下面大大地写着艾滋病毒阳性，贴在我的门上，这样走过去那个区域的人就能看得很清楚。然后，他们让我乘飞机回德国，让我付机票钱，然后告诉我，如果我想的话，我可以在24小时内回来。”

性工作者，挪威

在挪威，除非“必要”，执法人员分享个人信息（包括艾滋病毒感染状况）是非法的。其他国家也反映有艾滋病毒感染者的保密信息外泄事件。在坦桑尼亚，参与者反映，看守所的警官经常公开询问抗逆转录病毒药片属于谁。

…移徙性工作者在获得司法救济方面遇到过多的障碍。其中包括语言、逮捕风险、长期拘留和递解出境以及警察的种族特写。

如本简报文件所述，移徙性工作者在获得司法救济方面遇到过多的障碍。其中包括语言、逮捕风险、长期拘留和递解出境以及警察的种族特写。非洲和拉美的一些NSWP成员组织强调，保守的规范、市政行政法律、交通障碍以及大城市

以外缺乏宣传服务，使农村性工作者特别脆弱：

“我们协会在民主刚果农村地区很活跃，那里工作的性工作者更容易成为受害者，更容易受到骚扰和勒索。警察、军队（执法、安全和情报人员）骚扰他们并索要贿赂。他们常常被逮捕和拘留。不仅是执法人员，还有村里人。他们很难上法庭，因为害怕法律镇压。”

农村妇女和平与发展之友，民主刚果

“自2004年以来，厄瓜多尔警方没有逮捕在城市从事性工作的妇女，但在农村地区则不同，因为性工作区远离该地区首府，[警察]滥用权力敲诈和控制女性性工作者。当教育妇女她们自己的权利后，这种情况减少了，没有警察能要求他们的证件或健康证明，敲诈或要求性服务。”

性工作者平台，厄瓜多尔

建议

- **将性工作的所有方面非刑罪化。** 政府、政策制定者和倡导者必须积极推行性工作的全面非刑罪化,包括性工作者、客户和第三方。刑事定罪是阻碍性工作者向警方举报犯罪的主要障碍,还助长执法人员虐待和暴力。
- **投资于对执法人员、法官和其他司法系统工作人员的教育和敏感性培训。** 减少偏见和歧视对于确保性工作者可获得司法救济是必要的。
- **要求执法人员对针对性工作者的暴力和虐待行为负责,并确保国家暴力受害者享有可执行的赔偿权。**
- **优先考虑基于社群的法律援助和法律知识培训,包括培训性工作者担任律师助理。** 性工作者和性工作者主导组织最有能力促进和传播有关其权利、法律制度和服务的知识,这是促进性工作者获得司法救济的关键。
- **确保受害或被指控犯罪的性工作者有可及、可接受和负担得起的法律服务。** 各国政府应确保国家服务对性工作者可及且友好。还迫切需要为向性工作者提供法律服务、教育和信息的非政府组织增加资助。
- **积极寻求性工作者权利组织和为其他边缘化群体争取获得司法救济的组织之间建立伙伴关系和协作的机会。** 与为在性工作中比例过高的边缘化群体(如男女同性恋、少数族裔、移民、艾滋病毒感染者者和妇女)合作尤其相关。

结论

一系列障碍阻碍了性工作者获得司法救济的机会。许多国家都有歧视性工作者的法律,而刑事定罪使向警方报案具有重大风险。性工作者经常遭遇淫威执法,包括非法和任意逮捕拘留。由于政府未承认性工作为工作,大多数性工作者缺乏获得劳动权利的机会,即使在卖性合法的国家也是如此。性工作者在法律制度的每个阶段都面临着偏见和污名,从与执法者打交道到法庭上的起诉和判刑。对性工作者的犯罪不如对他人犯罪受重视,当性工作者被指控犯罪时,他们经常得不到基本权利。缺乏对其权利、法律制度和受害者服务的了解导致获得

司法救济机会受限。来自比性工作者更边缘化群体(如跨性别者、艾滋病毒感染者、有色人种、毒品使用者和移民)的性工作者,在法律制度中则面临更多的障碍。

性工作者缺乏获得司法救济的机会,其背景是歧视性法律造成的不平等、交叉的歧视以及国家未能确保法律系统对所有人平等可及。性工作者

面临的司法不公是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使性工作者容易受到暴力侵害,同时使他们不受法律平等保护。为了促进性工作者的安全、健康和福祉,政府必须承认并处理这些侵权行为。

性工作者面临的司法不公是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使性工作者容易受到暴力侵害,同时使他们不受法律平等保护。

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致力于保障性工作者和性工作领导者机构的底层声音能够被听到。简报记录了性工作者在地方、国家和区域层面所面临的问题，这些简报也会试图分析全球趋势。

“性工作者”一词反映了性工作者社群内部巨大的多样性，包括但不限于：女性、男性和跨性别性工作者；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和双性恋性工作者；异性恋男性性工作者；感染艾滋病和其他疾病的性工作；使用毒品的性工作者；年轻的成年性工作者（年龄在18-29岁之间）；有证件和没有证件的流动性工作者，以及流离失所者和难民；生活在城市和农村地区的性工作者；残障性工作者；以及被拘留或监禁的性工作者。



The Matrix, 62 Newhaven Road
Edinburgh, Scotland, UK, EH6 5QB
+44 131 553 2555
secretariat@nswp.org
www.nswp.org/zh-hans

NSWP是一个私营非营利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编号: SC349355

项目支持:



NSWP是“弥合差距——重点人群的健康和权利”的联盟伙伴。这个独特的项目致力于解决性工作者、毒品使用者和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人士所面临的人权侵害，以及获得艾滋病和健康服务的情况。请登陆www.hivgaps.org了解更多信息。